

國家在濱海地區的治理理念，作者也多有揭示。此外，作者仍積極開拓海洋史研究新議題，如對海界利權劃分的探討，均不乏灼見。

如果說本書尚有進一步拓展之處，一是本書在理論架構上似可更加完善。本書寫作主線可分為「明」「暗」兩條，明線表現為作者提出的「壟斷—依附」社會結構，是對濱海社會自明中葉後逐漸形成的人群活動和生產組織方式的高度凝練，即隨着各色人群對濱海利權的佔有，逐漸形成豪強壟斷濱海資源並得到官府承認，而貧民依附豪強的局面，清初的諸多舉措也意在打破這一結構。暗線則指「政治疏離感逐漸消解」一說，體現的是地域社會不斷整合進大一統國家的歷史進程。不可否認的是，身處濱海地區的人群，與以農耕社會管制模式為主的王朝國家間的關係，是其諸多關係中最為重要的一種，但與王朝國家政治疏離感不斷消解的同時，其與海洋世界的聯繫也愈加緊密，海洋的流動性為其生活帶來了另一底色。因而，在思考閩粵濱海地區社會整合過程時，還需從王朝國家與環南海地區兩大區域互動的層面上加以把握，其中跨國、跨區域間的人群交往對該地域社會形態的塑造應得到進一步重視。此外則如作者在本書末尾所言，試圖進一步探究濱海地域人群的生產組織形式。已有學者指出，沿海居民的經濟活動如遠洋捕撈、近海養殖等，生產組織成本高，非一家一戶所能承擔，因而濱海地區長期存在各種形式的雇傭關係，並且這種經濟上的聯繫還與村社組織等相互交織，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對人群日常生活及地域社會變遷的影響，仍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正如作者結語對傅衣凌先生有關商人與商業資本論述的回應中稱：「濱海社會之研究，可能還需以海洋人群生計特點及社會團結機制為出發點，這樣我們對濱海之地多樣而複雜的經濟和社會歷史形態才可能得到更進一步認知和理解」（頁399）。

謝殿誠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王明珂，《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422頁。

關於人類心理陰幽的認知多是心理學者亟力探索的層面，多半透過觀察與實驗勾勒分析個案的潛藏意識，而在人文學科的現象應用上，則以「幽暗

意識」最為人所知。再進一步說：文化整體當中的「人」與具體脈絡生活下的「村落」有所不同，雙方具有文明理性與原始經驗的相互角力，其實都已構成目前對於人類社會存在形式的認知資源。至於如何透過以上兩種認知角度與背景視野，理解當今所處的社會面貌呢？則在王明珂教授近來著作《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書中或可得到解答。王教授長期在青藏高原進行羌藏田野調查，即從「邊緣」理解中國文化，亦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而「有感於自身所處的時代現實」（頁6），不難發現我們既身處理性與除魅的時代，同時也透過社群生活的連結，更是身處在一種「時時發生的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頁8）的時代。要如何能夠認知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以致於能夠尋求避免危險，至少自己盡可能不要身陷其中，則是作者想要解答的問題。作者論述是建立在以下的幾本著作基礎之上：《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這既有人類學者對於邊緣的、庶民的、生活的、口說傳統的重視，也有理論上的沿襲與推進，即是本書「毒藥貓理論」的充分運用。

作者書中的「替罪羊」(scapegoat) 與「毒藥貓」兩種詞彙交互使用，它的衍生意義與概念提煉的來源在於川西羌族傳說，特別是能夠將此概念援用至世界其他各地發現之類似事件，嘗試凸顯相當程度的解釋效力。因此，「內憂」與「外患」之說，就不僅僅是一種「理性化」「文明化」之後的憂患意識，而是可追溯至「原初社群」所反映的心理狀態。也正是與岷江上這些村寨人群的狀態相關，是以此作為分析對象原因之所在，當然也有作者本身田野調查結果的開展延伸。這些人群是「在20世紀上半葉，甚至從公元1-3世紀的東漢以來，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便非一與世隔絕的、有獨特文化與社會結構的人群」（頁15）。因此也適度反省1960年代以來學界對於「土著文化」中外來因素的忽視。作者採取的研究進路不僅是人類學與歷史學交互為用，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歷史本質採取一種批判反思的態度，是什麼樣的動因造成我們現在理解的世界？如果說我們的文化環境充滿恐懼與暴力，那麼可以追溯至哪一種時期產生？又有沒有辦法克服如此可能發生的困境，讓人類生活得以更加美好呢？

本書結構分為八章，加上前言與結語，基本上扣緊「替罪羔羊」與「毒藥貓理論」，闡述相關的歷史背景與傳說風潮，以及當代國族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甚至也討論「網路村寨」中的毒藥貓現象。因此，全書橫跨的時間不短，包括面向也是相當多元，可稱得上是從「原初社群」到「網路社群」的探索之作，並且問題意識集中在「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對於「社

群」的觀察，作者不同於過往人類學家將田野研究視為一「孤立村落」的「小社會」（頁15），所以賦予田野調查的意義更加豐富。這裡亦涉及如何定位田野研究之意義與目的，從作者早期接觸20世紀上半葉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作為立論基礎，更加充分考量「外來因素」對於當地文化的影響，彰顯其中如何認知與感受的過程，並思索此種文化如何逐漸地形成「一個個彼此防範、敵對的孤立社群」（頁16）。就本書來看，「集體暴力」與「文明化」是理解人類歷史的兩大面向，一方面確有先後發展關係，另一方面又在書中可見互為辯證，並非一刀兩斷式的現象。從作者關注當代國族、宗教極端主義來看，更可以說明歷史的延續性質實屬重要，而不能僅僅限於近代所討論的「文明」範疇而已。因而作者的立論基礎，從學科作為觀察當然是多元視角的展現，但從田野調查來看，更能彰顯本書的立論特色，即在於透過不斷呈現的「替罪羔羊」與「毒藥貓理論」的案例形象，論述此種觀點不僅僅存於過往，也仍在當代思維造成廣泛迴響。只是眾人習焉不察，不知探求現象之根源，因而作者在此補足學界較為缺乏的研究視野。

然而作者的田野調查並非建立在任何一位被人們視為「毒藥貓」或「替罪羔羊」的個案上，理由是「無法為了研究而再度傷害被孤立的社會邊緣人」（頁25）。並且充分考量是否因研究所需，而會造成不必要的矛盾與衝突。如同作者在田野經驗中所說：「羌族村寨民眾一般也不會直指某人為毒藥貓，因這是極嚴重的事」（頁25）。令人好奇的是書中觀點的建立，如果沒有文獻可靠的資料或當事人的現身說法，如何論證作者強調的主要觀點呢？就此可以依照以下思路來理解：一方面作者自道不完全信服「文化傳播論」(diffusionism)的說法，另一方面在歷史上又有層出不窮的民俗儀式及神話傳說，那多半又共同指向人類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因此，也容易導向一種相關思路的延續，即尋找人類共同的心理，即所謂「人類社會共性」（頁26）的內涵為何。這就涉及「社群」，特別是「原始社群」的議題，而必須暫時先擺脫當今人文社會科學的種種既定觀念，如以「理性」「人文」與「現代化」加以理解之框架，就此來說本書脈絡必定有某種程度上的拆除或從中解放出來。所以，作者所採取的田野調查，是一種「經驗的經驗」，即已經提煉相關概念可供運用，如此之田野調查就不僅僅局限於民族志報導，雖然那也是考察相當重要的環節。換句話說，透過不同時代與區域之集體暴力與恐懼，其實多少都與「原始野蠻」的想法相關，有其文化心理的蘊涵值得深入發掘。

除此之外，作者身處的時代現實也提供他撰寫本書的重要契機，所以在歷史文化脈絡尋找可能的解釋之意，也成為書中的顯著標誌。外在世界紛擾不已，起因於人類族群的「界限」則從未消失殆盡，如同他在《羌在漢藏之間》書中亦提及：「毒藥貓不僅在羌族中不容易斷根，在所謂的『文明世界』中也從來沒有斷根過」（頁5）。作者透過第一手的田野調查，得知廣佈於岷江上游的村寨人群之間的文化狀態，不論是從內部或外部觀察，都不能說它僅是眾多文化現象的個案，沒有與其他地方有某種程度上的聯繫。情況恰恰相反：透過岷江上游的村寨人群可以作為絕佳的觀察起點，既有較為顯著的「內部邊緣的毒藥貓（內憂）或外在的毒藥貓（外患）來孤立自己」（頁5），另一方面亦雖有隨着社會情境的轉變，但此種文化現象仍是普遍存在。用作者的話說，即是「人類社群生活中的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不只存在於我們這時代：人們在內外交煎之恐懼下找尋替罪羊並施以暴力，是一個老議題」（頁6）。所以，作者既將田野調查置於具體情境加以考察，一方面也結合所處的時代現實，田野解釋的效力逐步提升，皆可以從書中列舉的各章實例加以佐證。某種程度上，作者亦不斷扣問人類社會複雜現象，不僅僅限於某一地區，而是想要瞭解「我們思慮中陰幽的一面」（頁8）。

作者爬梳許多相關理論，以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純淨與危厄》(*Purity and Danger*)凸出人類社會常有的法則與規範，界定何為聖潔與污穢（頁18）；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宮廷社會》(*The Court Society*)則是透過上層士人的服裝、禮儀與談吐等身體符號形成階級上的「邊界」（頁19）；而有意凸顯「原初社群」與「社會階級」不絕如縷之關聯，亦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區分》(*Distinction*)即是主要論述後者與群體權力的關係（頁19），端看如何建立與穩固的過程。然而，這也帶出一項思考議題：即人類的集體暴力成為書中最重要的主題，並且可能假借「文明」之名而使得暴力之實隱藏其中。某種程度上，本書也延伸至「民族」「族群」「國族」之間的衝突心理，沿續歐尼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民族主義的探討，作者提出的重要論述是「近代民族國家可被視為人類古老『原初社群』理想的復辟」（頁24）。看似理解建構的一面，也更趨於田野調查之際，更明白觀念影響生活的巨大推力，某種程度上也意謂必須把探討焦點置於影響社會人心的要素，而並非純粹建立「理論」，甚至要從「理論」中釋放出來（頁24）。作者認為「歷史」與「神話」敘事應當有所區分，但是關係卻是並存而不悖；特別是起源與祖源歷史在現代學者看來，似乎是近於「神話」，但這卻是「凝聚人群的

主要黏着劑」（頁63），可見歷史之動力或依附於情感認同，以致與所謂「理性化」「文明化」程度相差甚遠。

「毒藥貓」現象調查在作者筆下，不僅是多少與懼怕問題而已；從另一面向思考也是「不能沒有」的問題（頁93）。這是有趣的提問方向，就此延伸思考之處在於「毒」「暴力」為何在社會與文化語境之中，可能存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以致具有存在的「正當性」。「邊界」與「純淨」相關，更與「污穢」是一體兩面之事，如同作者援引1649年住在烏迪內（Udine）附近之男子米謝拉·索比（Michele Soppe），因行巫術而被逮捕之供詞：「他們必須做些邪惡的事，以符合魔鬼授予他們的權柄」（頁123）。因此，不論是正面意義上的「邊界」以區分「我群」與「他群」，或是從供詞所彰顯較具負面之意涵，都可以視為一種「歷史事實的文化殘餘」（頁125）。作者則是試圖將此「文化殘餘」勾勒出來，進而提升至一種原始心理的延續與發展，打破何謂「歷史」的既定印象，並從「邊界」理解「中心」的可能性。以此作為一種「社會記憶」或是「社會文本表徵」（頁135），如此可以擴充歷史與人類學的解釋力道，但也並非走向心理角度——如柔波教授（Lyndal Roper）用「心理劇場」（theatres of the mind）之進路以單一呈現當事人的生命史早期階段（頁133-134）。作者顯然是將「毒藥貓理論」與「替罪羊現象」置於更廣大的文化視野：「歷史為何能讓人們的社群認同與社群邊界觀念自然化、合理化」（頁205）？如此解答之來源如同上文所說，奠基於作者寫的幾本論著之上，並在此得到一種正反相合的整體掌握。還有從田野調查過程，說明「什麼是歷史」到理論反省得出「為什麼是這樣的歷史」，並提醒我們其實不該忽略「原初社群理想之延伸想像」的層面（頁207）。

暴力與恐懼、秩序與邊界，也都指向「宗教」議題，更讓本書主題延伸至許多層面；追根究底的結果，即是作者反復強調「人類一直難以脫離原初社群的認同與情感的掌握」（頁288）。但是，如何論證「原始動機」，訴諸於「部落主義」（頁330），能夠爭取多少同意之說，則必須建立在對於歷史事件的陳述，才能具體說明此種認同、情感與動機之所在。作者所勾勒的歷史發展與世界變化，似乎都可以透過「毒藥貓」與「替罪羊」之理論學說作為一種觀察視角，已經與過往的「獵巫」文化論述有些不同，也有異於羌族人所謂「無毒不成寨」的既有認識。歷史發展的重新檢討，則需要考量原初、早期的部落之心理狀態，也是一項值得關注的議題。因此，作者在東西思潮的傳統之下，並沒有完全接受「啟蒙」伴隨而來的覺醒之說，「文明」與「理性」都是一種相對且經歷重大變化，且經人為有意識的選擇而

定。在此意義上若看那些沒有覺醒、未文明化、缺乏理性的部落，歷史還能為其安排什麼地位，呈現什麼意義？進一步來說，作者則是將歷史意義的建立所能參考的史料範圍不斷擴大，將發生衝突的原因更多往心態與觀念上着手，提煉相關概念諸如純淨與污穢，何謂暴力與恐懼的隱藏因素也都必須透過田野調查補足理論可能的局限，增強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以及對於所處的社會，所經歷的文化有更多的認知能力，因而能夠避免陷身其中的窘境。

梁右典
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

吳漢泉著，王楊紅、劉俊濤、呂俊昌譯，《朝貢與利潤：1652-1853年的中暹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332頁。

原書於1977年出版，但由於該書是學界公認的研究中泰關係、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經典名著，40餘年過去價值仍然不減當年，想必這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推出譯著的原因。

該書將兩國實際維持朝貢關係的時期，大致分為起步（1652-1717）、發展（1717-1767）、繁榮（1767-1834）、衰落（1834-1853）四個階段，認為朝貢關係和中暹貿易進程的發展並行不悖，相輔相成，暹羅的王室貿易壟斷制度與中國朝貢體系恰到好處的對接，使得中暹的貢船貿易和私人貿易都發展起來，港務廳的華人財務大臣、中國帆船上的留暹華人、洋行中的福建廣東浙江商人等人群在這片海域上交織在一起，共同締造出繁榮的貿易圖景。

第一章「中暹貿易的國際背景」將中暹貿易置於廣闊的東亞海域中，中國、暹羅、日本，以及地理大發現後葡萄牙、荷蘭、英國的船隻來來往往。東亞海域海上貿易網路幾乎全由華人經營，這個貿易也被稱為帆船貿易，以臺灣海峽發端分為西洋路線（東南亞和印度洋）和東洋路線（東印度和日本），暹羅就處於西洋路線的中心地位，中國提供絲綢、瓷器等奢侈品，日本提供銅，暹羅提供獸皮、牛角、蘇木等。地理大發現後，先是葡萄牙人參與貿易，將中國絲綢轉輸入日本，佔據馬六甲後與暹羅直接貿易。而後17世紀上半葉荷蘭在與葡萄人的競爭中勝出，給暹羅強加的貿易條款包括不能雇佣華人經營王室商船，但並未成功。18世紀荷蘭人在暹羅的商館很快關閉，貿易連年虧損。17世紀前30年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鼓勵商船出海貿易，朱